

第十三章

宪法的民主：美国草案的日本化

2月13日，惠特尼准将与三位随从造访了日本外务大臣的官邸，并向松本烝治和吉田茂提交了GHQ的宪法草案，当时在场的有吉田茂的侍从白洲次郎和一名官方翻译。日本方面确信他们的会见是为讨论松本的提案（此提案最终于2月8日提交），当惠特尼以断然的态度对此置之不理时，日方着实大为惊愕。除了在场的翻译之外，松本、吉田和白洲也都懂英语。惠特尼字斟句酌而且故意语速很慢。那天他还患了流行性感冒，正发着高烧。这或许使惠特尼在表达自己见解时变得罕见的激烈和锐利。¹

他开口道：“前几天，你们提交给我们的宪法修正草案，在最高司令官看来，完全不可能作为一份自由和民主的文件被接受。”随后他分发了GHQ民政局起草的宪法草案，并解释说，麦克阿瑟赞成这份“以他的观点看来体现了日本局势所要求的诸项原则”的草案。会晤后，立即由惠特尼的三位助手共同完成的详细会议记录提到，日本官员“显然惊呆了”，“此时整个气氛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²

375

美国人退到庭园里，留给他们的对手阅读英语文件的时间。当白洲走出来加入他们的行列时，惠特尼刺耳地说道：“我们刚才颇为享受了一番你们原子能的阳光。”这句刻薄的闲话，勾起了到底谁是胜利者和战败者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忆。在1956年出版的麦克阿瑟传记中，惠特尼添油加醋地描述了这一插曲，还添加了一个细节：此时，一架B-29轰炸机恰好从他们的头顶飞过。³

惠特尼准将认为自己放的冷箭颇具心理威慑力，而他的箭囊中还另有储备。在松本和吉田对草案做了大约半小时的文本细读之后，双方重新会合，惠特尼再次拉弓放箭。他指出接受 GHQ 宪法草案的诸项规定，是确保天皇“安泰”的最佳选择。他声称，假使日本政府拒绝此方针，最高司令官准备将草案向日本国民直接公布。尽管这一宣称超出了惠特尼本人的权限，但是麦克阿瑟随即对这一威胁给予了强力支持。正如美方的会议记录所示，惠特尼补充说：

麦克阿瑟将军感到，这是许多人认为反动的保守派集团保留权力的最后机会。唯一的办法是急速向左转。如果你们接受了这个宪法草案，你们就大可放心，最高司令官将会支持你们的立场。我不可能更过分地强调这一点，你们接受宪法草案是你们残存下来的唯一可能。最高司令官坚决认为，日本国民应当有权在这一宪法和不体现此诸项原则的任意宪法之间自由取舍。

日本人并未借助翻译就理解了这些话，他们掩饰不住苦恼之色。惠特尼回忆说：“白洲先生好像坐到了什么东西上，一下子站了起来。松本博士倒抽一口冷气。吉田的脸色阴云密布。”当这些带来不幸消息的人准备起身告辞之际，吉田才从满天阴云中回过神来，敦促他们一定要对此次会晤完全保密。

“保守派的最后时机”

376 惠特尼在2月13日的会见中，为日方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他明言，尽管草案的基本原则没有商量的余地，但是日方无须全盘接受 GHQ 的宪法草案。松本确实想抓住这根救命稻草，而数日之后他才完全明白，自己已处于绝境之中。私下里，他先前曾嘲讽 GHQ 草案的“业余”水平，对国会一院制的不切实际加以指摘。最终他发现，这是美国人作为议价筹码唯一愿意让步的所在。⁴

日本政府在最高统帅眼中显而易见地完全丧失信用之前，白洲和松本最后一次尝试说服惠特尼：日本保守派精英实际上拥有与美国人一样的民主理念。他们争辩说，问题只在于二者的方法不同。白洲在致惠特

尼的信中说，美国人的方法是“直线的和直接的”，而他们的方法则是“迂回、曲折而细致的”。他甚至在信中附上草图，来解说日本人从起点到达目标的途径是山间的一条蜿蜒道路，而美国人直达目的就像坐飞机一样。惠特尼不为这种文化图解所动，他回复白洲说，最高司令官将允许对草案进行小的改动，但是其“原则和基本形态”不容变更。⁵

松本主张，如果宪法不符合国情，将招致专制和暴政（日本近几十年的专制和暴政，倒显然没让他在这个问题上有所踌躇）。难以置信的是，即使面对盟军总司令部的最后通牒，他仍然继续坚持日本国民在民主方面需要长期、和缓而且慎重的政治监护，而松本委员会的宪法草案正应当照此理解。他致函惠特尼，“比方说”，他的草案是“为了民众的利益而裹上糖衣的苦药”。任何更加激进的主张都会吓坏稳健派、刺激过激分子，使日本国内陷入大混乱。⁶

对 GHQ 民政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令人厌烦的老调重弹。无论美方提出何种改革提案，保守派都无一例外地回应说，那将诱发“无序、混乱和共产主义”。凯德斯后来评述，他们如此频繁地抛出赤化危险，使“我们对共产主义的威胁都免疫了”。甚至是忠实的共和党支持者惠特尼，也表现出对这种末日论调门的不耐烦。他简洁地向松本交代，如果内阁在 48 小时内不对此采取行动，最高司令官将如约定的那样，直接将草案公之于日本民众。⁷当松本最终意识到，其他人或许输掉了战争，而他却输掉了明治宪法的时候，显然是肝肠寸断。

盟军总司令部原本期待日方会对 2 月 13 日的会晤立即进行内阁审议。为推动进程，惠特尼及其助手甚至准备了超过 15 份的草案副本，发放给吉田和松本认为适当的人选参阅。然而，日本政府并不像美国人想当然的那样以集体决断的方式处理重大问题。直到 2 月 19 日，日本内阁才被告知 2 月 13 日的会晤，当时松本苍白而颤抖地做了首次陈述。他告诉同僚，惠特尼准将发现他的草案无法接受，并代之以 GHQ 提议的草案。据松本总结，惠特尼的立场认为，美国人并未将此草案强加于日本政府，但是麦克阿瑟将军确信这是保护天皇“圣体”（显然松本使用的是英语单词 person）不受反对者攻击的唯一方法。⁸

数位阁僚的即时反应是，美国人的立场绝对不可接受。币原首相同意此看法，但芦田均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由赞成接受草案，他后来在国

会的审议中成了关键人物。芦田警告说，如果内阁回绝了GHQ的要求，美国人将如威胁所言把草案公之于众，随之的一系列厄运就会降临。“奴颜婢膝的”媒体将会支持美国人。内阁将被迫辞职。美国草案的支持者将被期待有所作为，并可能在即将到来的总选举中获胜。总之，保守派必须谨防被人气高涨、支持民主的势力夺去议席。⁹

他们一致同意此事应当从长计议。2月22日，在币原与麦克阿瑟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晤之后，内阁审议重新开始。这次审议，首次配发了GHQ草案前两章关于天皇与放弃战争问题的大致译文。（由于被打击得晕头转向，日本政府直到2月26日才分发全部译文。）币原报告说，最高司令官并非不讲道理。麦克阿瑟宣称自己是全心全意地为日本着想，
378 并强调自己“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天皇安泰”的内心意愿。如币原所述，麦克阿瑟对苏联、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想法做了可怕的暗示，“其令人不快的程度超出你们的想象”。币原首相还引述了将军表达的信念，“日本应当通过声明抛弃战争、担负起道德上的领导地位”（币原是用英语moral leadership传达这个字眼的）。¹⁰

币原首相仍然对大幅修改GHQ宪法草案寄予希望，但在当天松本发现，即便想要抢救明治宪法的一小部分也已经不可能。折磨人的美国方面直率地告知他，使用既存的明治宪法作为修改基础是“不可能的”。当这位自负的学者官僚切齿问道：“你们到底认为新宪法草案中有多少条款是基本的而且不容变更？”惠特尼回答说：“写成的整部宪法都是基本的……概而言之，我们将此文件看作是一个整体。”罗威尔（Rowell）上校还唯恐对此有所误解，他补充说：“新宪法的结构相互交织，每章之间相辅相成，因而不能删削任何章节。”应松本的请求，美方同意国会两院制，条件是两院都必须经国民投票选举产生。¹¹

2月22日，币原与数位政府高官，就美方草案向裕仁天皇做了概要说明。这天是民政局给出的日本内阁“原则上”承认GHQ草案的最终期限，据说天皇答复得很果断。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理解，天皇或许不像他的内阁大臣们那么犹豫不决。他意识到自己的“圣体”得到了保护，所以他的立场也就更简洁明了。裕仁天皇不像他的忠实臣民，他可以自由地考虑对明治式的天皇制的变更，而不必担心大不敬。无论如何，天皇对GHQ草案的承认，使得内阁大臣们减轻了良心上的歉疚，

并且使他们能够遵从盟军总司令部的要求。¹²

与此事件相关的日程安排，多少有点儿爱国主义的迷信色彩。正如惠特尼准将高兴地表示，盟军总司令部完成草案的最终期限2月12日，正巧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生日。币原内阁接受草案的回复期限又与乔治·华盛顿的生日重合。¹³ 然而，即便在日本政府屈服于最后通牒之后，民政局还是被告知，币原内阁的阁僚间仍然存在“激烈的斗争”。政务大臣兼书记官长榎桥渡，是就这些问题向盟军总司令部提供消息的主要人物之一。³⁷⁹ 他以严峻的语气描述了这些后台斗争。据榎桥说，旧天皇体制顽固的捍卫者，在官僚、前军官和财阀领导人当中仍然为数众多。官僚由于其权力来自于身为天皇忠实仆人的精英地位（而非“公仆”或者人民的仆人），唯恐失掉自身的权威。榎桥还观察到，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阁僚们真心忧惧，一旦天皇的特权被剥夺，将会引发恐怖活动和暗杀。¹⁴

翻译马拉松

这些事态的发展，与东久迩宫关于天皇应当退位的令人震惊的公然暗示同时发生。“天皇‘圣体’”与天皇制，突然间前所未有地岌岌可危。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3月4日，日本内阁向盟军最高统帅正式提出最终被称为“最初的日本政府草案”的宪法修正草案。¹⁵ 从表面上看来，这份草案完全无异于是GHQ草案的日译本。实际上，松本与助手们用多种方式冲淡了GHQ草案的建议方针，包括玩弄术语变更草案的意图。

3月4日上午10时，松本及助手佐藤达夫，由两名翻译陪同，向GHQ民政局递交了他们的草案文本。这次他们交给美国人的，是没有任何相应英文翻译的日文版草案，就像是2月13日“原子能的阳光”会见只有英文草案的重演。接下来是30小时的马拉松会晤，日美双方合作将日文草案重新译为英文。其间，美方不停地参阅日英词典，并将日本草案新的英译文与他们的GHQ初版本对照检查。在此漫长的无眠无休的艰苦奋斗中，双方以军用应急干粮补充体力，从5加仑的咖啡罐中分倒咖啡提神。在此情形下，对日本人来说，味道不佳的食物，似乎成了被迫接受GHQ宪法草案苦恼的象征。

无论如何发挥想象力，这都不是令人愉快的场面。尽管如此，颇具

戏剧性的场面还是时有所见。松本和凯德斯对天皇与内阁的关系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孤立无援的保皇派松本，指控新政拥护者凯德斯企图不仅将国体甚至是日本语进行重新改造。正午过后，松本怒气冲冲地离
380 去，将宪法草案的翻译和修订工作留给佐藤和两名翻译，佐藤他们不得不单独应付至少 16 位美方官员及其日裔翻译人员。

此后，当凯德斯将自己的两个拳头交叠在一起，比划着说明将内阁明确置于天皇之上的重要性时，佐藤和凯德斯之间也一度剑拔弩张。佐藤倒不甚留意凯德斯阐述的观念，而是被凯德斯拳击般的紧张姿态所激怒。随后凯德斯得出结论，日本人不能想象在政治上任何人比天皇优越，是一种既神秘又矛盾的态度。正如凯德斯所见，一方面，日本人主张在明治宪法下天皇本质上是无权的，这是使天皇与战争责任完全分离的重要论据；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特权不可侵犯。¹⁶

比特·西罗塔（Beate Sirota）的双语技能，使她在交换意见时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发现自己对日本人古风犹存的善意，竟然能够推进男女平等的大业。正如凯德斯对她的描述，这位瘦高个的女孩，在许多问题上反而都支持日方的立场。随后，当商议到西罗塔起草的有关女性权利的条款时，凯德斯不失时机地提议说，既然西罗塔先前对他们很友善，日方现在也应当善待她。通过这种友好的互惠，日本现代宪法中最强有力的男女平等条款被保留了下来。另一个戏剧性的场面，则是吉田外相的助手——受英国教育、沉着稳重的白洲次郎的登场，使美国人经受了一次小小的心理打击。午夜刚过，马拉松会议进行到半途，白洲不经意间译出了每个人都在努力翻译的日本草案大概的英译文，因为此前他就一直将日语草案揣在口袋里。¹⁷

在这次令人精疲力竭的会议过程中，美国人发现，日本人在 GHQ 草案的“翻译”中，掺进了许多实质性的变更。例如，英语的“建议与同意”（advice and consent），在日文版中变成了“辅弼及协赞”（advice and assistance）。日本政府所谓的翻译，还将 GHQ 草案的序言省略，而序言中强调了“人民意志的主权”。他们删除了废除华族制度的条款，提出创设限制众议院权威的参议院，以及改变有关地方自治的条款并加
381 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另外，他们削减多项有关人权保障的条款，有时重

新插入明治宪法中使用的套话。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只有“在不妨害安宁秩序的范围内”才得以保障。同样，“除去法律规定的场合外”，禁止书报检查才能够实行。劳动者组织、团体交涉和集体行动的权力，同样受到“依照法律规定”的限制。日本政府的草案还删除或削弱了许多特定权利，包括外国人的权利，理由是这些权利更适宜在宪法之外进行立法措置。¹⁸

最后，尽管睡眠惺忪、精疲力竭，顽强的佐藤终于成功说服美国人：特定的权利，最好留待宪法之外的立法解决。他还成功保留了对一些关键词翻译的微妙差别，如“people”（人民）和“sovereignty”（主权）。立足于这些微妙的基点，通过政治、意识形态、语言和文化机能的综合作用，使得日方宪法草案几乎不可避免地成了与美国草案不同的文本。

最明显的莫过于“the people”（人民）的概念，它是美国人民主权观念的核心，能够唤起植根于美国经验的“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所有的历史和文化意蕴。日本人没有可与此相比的人民主权传统。明治宪法所说的“臣民”（subject），与“people”（人民）的概念不可同日而语。松本及其助手面临的问题是，用哪个词汇来对应翻译“people”（人民）。一种选择是翻译成“人民”，这个词通常是用来翻译美国宪法或是亚伯拉罕·林肯的经典表述：“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然而，现在“人民”一词的用法，却带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暗示，并传达出对抗权力的意味。

尽管外务省准备的GHQ草案的译文，当初将“people”译作“人民”，松本和佐藤却弃之而采用了本质更为保守的“国民”一词。以“国”和“民”这两个汉字表示的词汇，是个日常用语，其含意是人民与国家的融合，不存在对人民与国家、政府或包括天皇在内的最高权力之间潜在的敌对关系的暗示。相反，正如日本政府随后的特意说明，“国民”的概念包括天皇本人，从而表明天皇与国民的一体性。战争年代，“国民”是个常见的宣传用语，本质上与“日本人”甚至“大和民族”是同义词。

佐藤达夫后来坦率地说明，新宪法为何选用约定俗成的、具有民族

主义意味的“国民”概念。他陈述他与助手们“采用‘国民’一词是因为：(1) 我们想要强调人人是国家的一员的意思；(2) 我们想‘人民’的说法，可能会造成对天皇加以排斥和敌对的感觉”。尽管民政局顾问提请注意“国民”一词的保守意味，惠特尼准将和凯德斯上校并不认为此间的差别有多么严重，并且许可了这一译法。¹⁹

“sovereignty”合理的对应是“主权”。然而，在币原首相的劝说下，日本政府草案以另一用语“至高（supreme height）”取而代之。与“主权”不同，“至高”是一个含意模糊而古旧的词语。“至高”这两个汉字的字面意义是“最高的高度”，但这个词汇并不具有政治意味。实际上可以说，对于生活在二十世纪中期的日本人而言，这个词没有什么意义。当然，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暧昧的词语，保守派希望能够钝化和模糊美国“人民主权”观念本身激进的推动力。他们一想到与天皇同等甚至于高于天皇的主权形式，就吓得目瞪口呆。²⁰

3月份的第一周，这些故意歪曲的翻译，能够历经美国人30小时的仔细推敲而过关，对日本政府来说真是令人欣喜的胜利。但就事件的全过程而言，这一胜利则是甘苦参半。因为“至高”的译法，未能进入日本国会最终采用的宪法草案，取而代之的是“主权”一词。3月5日下午4时左右，经马拉松会议诞生的草案，与日方前一日提交的草案有10点以上的实质性差异，而这些差异使这份草案更接近于GHQ草案的原初版本。²¹

3月5日，当佐藤终于步履艰难地挺过马拉松式的考验之后，日本政府也迎来了自己的最终结局。其后再未回到盟军总司令部的松本，于当天早晨向内阁详细说明了自2月22日以来所发生的事情。阁僚们午休之后，于下午2时继续开会。其间发生了一件小小的象征事件，简直就像是某种仪式。10份英文版的GHQ草案，显而易见是民政局数周前发放的副本，初次呈现在全体阁僚们面前。在这最后时刻做什么都已经回天乏力，而它们此刻出现在阁僚们中间，成了外国势力支配内阁大臣们命运的鲜活证明。

大约4点半，币原和松本前往皇宫，与天皇商讨局势并为翌日日本政府草案和天皇敕语的发布做准备。他们于傍晚8时返回内阁会议。币原传达天皇的话说，“于今形势之下，一切毫无办法”。皇室侍从次长木

下道雄的日记，清晰表明了当时宫中是如何悲伤乃至混乱的情形。他写道，天皇正感到巨大的退位压力，而“全世界的气氛”都在“反对天皇制”。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发了疯。日记复述了天皇给币原内阁留下强烈印象的那句话。木下记录道，如果不接受美方原来的草案，就不可能保全天皇本人。²²

盟军总司令部要求日本内阁决定当天是否接受与佐藤达成的宪法草案。经天皇批准，全体阁僚开始进行相关程序。晚上9时许内阁散会之前，币原做了简短演说。芦田均在其日记中有详细记述。币原首相说：“接受这样的宪法草案是极其重大的责任，必将累及子孙后代。当我们发布这份草案之时，一部分人会拍手喝彩，而另一部分人则会保持沉默。但是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无疑会对我们心怀愤恨。然而从大局着眼，今日之场合，我们别无他途。”

听到这些话，内阁大臣们都悲叹流泪，而首相本人也禁不住擦拭泪水。²³

宪法草案的发布

3月6日，新宪法以天皇与民主和平理念并重的形式，大张旗鼓地向公众发布。以天皇的名义，币原首相发表了宪法修正事项的详细“概要”，还附带发表了一篇支持各项新理念的雄辩的短文。很少有人能够猜到，数小时前首相和他的阁僚们还曾相对涕泣。裕仁天皇同时颁布敕语，简明宣布对国家既存宪章进行“根本性”修正的必要性，并要求政府遵从他的希望。同一天，麦克阿瑟宣布“天皇和日本政府决定向日本国民提交开明的新宪法……对此我深表满意”。²⁴

币原、天皇和麦克阿瑟三位的表态，为创造新的天皇制民主的后续论争奠定了基调。币原以对天皇的赞辞套语作为开场白，他对天皇“喜授内阁权力修宪”的敕语表示由衷的敬意。币原宣布，“为使我国国民与他国一道向世界人类的理想同一步调进发，天皇陛下非常决断地命令对现行宪法加以根本的修正，为建设民主和平的日本打下基础”。

币原首相随后令人感动地谈起，人类由战争步入和平、由残虐转向慈悲、由奴役迈向自由、由专制混乱走向秩序的道路。他以暗示性的语言话锋一转，表示宪章提案的和平主义本质，将把日本推向世界的前卫

地位。“如果日本国民在各国大家庭中占据了荣誉性的位置，我们必须注意日本宪法的意图在于，在国内确立民主政府的基准，对外领导世界他国废除战争。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全面放弃发动战争的国家权力，并且向全世界宣布，我们决心以和平手段解决与他国的一切争端。”接下来，币原首相表达了自己对全体日本人将会尊重天皇的慈悲意愿的信念。末尾他表示，宪法草案是在“同盟国司令部的紧密联络之下”才得以公布。

宪法草案大纲发表之际，裕仁天皇的敕语全文如下：

朕曩受波茨坦宣言之诺，日本国政治之最终形态，依日本国民自由表明之意志而决定。朕顾念日本国民正义之自觉、享有和平生活之热望、文化向上之希求，及抛弃战争、修万邦之谊之决心。乃依国民总意之基调与尊重人的基本权利之原则，将宪法加以根本之修正，庶几以定国家再建之基础。政府当局其体克朕意，必期达成其目的。

事实上，天皇是在命令他的臣民们支持新宪法的推出。天皇的这种姿态，与他从未行使真正权力的说法难免自相矛盾。从此时起，“宪法修正”的公布过程，沾染了旨在强调天皇慈悲为怀、授予更民主的国民宪章的陈腐敕语的气息。²⁵

像币原首相一样，麦克阿瑟将军也以一种庄严的语气讲到和平、民主和文化。他将宪法提案形容为“与人类关系最进步的观念完全对应……一种折衷的宪法、由知性的正直者提倡的、数种不同政治哲学的切实的结合”。他还决定强调而非弱化法案起草过程中盟军总司令部的紧密参与。他声明，“宪法是遵照5个月前我对内阁发布的命令，经日本政府阁僚与本司令部间的辛苦调查与频繁会议之后草拟完成的”。显然，这份声明并非完全属实，但关键是点明了盟军最高统帅密切参与了宪法的起草过程。

另一方面，承认宪法草案源自于民政局则是禁忌。不允许日本政府的高官提及GHQ草案，媒体也被严禁对此公然揣测。此后的国会审议，也被同样虚伪的氛围所笼罩。盟军总司令部在幕后密切关注国会审议，

并且抓紧各种时机解释宪法的基本原则——改宪后天皇的地位、放弃交战权、国民主权和理想高远的宪法序言，都像明治宪法下的天皇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必要时，总司令部还秘密干预促进或者压制日本国会的某些议案。正如秘密参与其事的一位美国人所言，民政局的人“仍然是在紧闭的大门后运作的官僚机构的成员”。²⁶

这是又一次的暗箱操作。然而，所有的日本人都知道暗箱的存在，宪法取决于美国人的介入是公开的秘密。首先，每个人对2月1日公布时被嘲笑殆尽的松本草案与日本政府如今号称亲自打造的进步的新草案之间的天壤之别，都大为惊诧。正如《读卖新闻》所言，“反动的松本草案”已经“被风吹散”。²⁷没人相信币原的“老人内阁”会经历如此的集体转变。这两份草案出自同一批人之手是难以想象的。

其次，日文版草案无论是基本的原则还是拙劣的文体，到处都有外国人染指的痕迹。扭曲的句法夹杂着古怪的措辞。贵族院议员中有不少学者，但是有的人在翻阅日文版草案时，甚至得参照官方提供的英译本。英文版与日文版草案的同时发布泄露了天机。贵族院议员高柳贤三是在位哈佛大学培养的专攻宪法的法律学者，他后来评述，“译文要比（日语的）原文容易理解”。²⁸

阻止媒体议论新宪章的真正出身的责任，落在了GHQ的民间审阅部肩上。在审查官使用的审阅指南中，“对SCAP（最高统帅部）起草宪法的批判”正式列入了所谓禁止发表的内容名单，而且明确规定禁止对SCAP角色的一切指涉。²⁹然而，新闻记者仍然尝试引发对草案的“奇特日语”和“可笑用语”的关注。有一句被GHQ审阅官用蓝铅笔删掉的话直言不讳地说，日语草案的“翻译不是很好”。³⁰可是，操劳过度的审阅官们不可能万无一失。甚至连一般抱支持态度的刊物，也设法将嘲讽的话语掺杂进社论当中。例如，《朝日新闻》描述政府草案“不大合身，就像是借来的洋服”。《时事新报》将其最初的反应比喻为：有人闻到了从厨房飘来的日本料理的香味，结果发现端上桌的却是西餐。于是不得不放下筷子，拿起刀叉。³¹

在此情形下，不乏冷嘲热讽和混乱局面，公众议论纷纷。但是宪法草案作为遭受战火洗劫的战败国的希望和理想的指路明灯，仍然具有极大的魅力。日本人被告知，他们应当考虑，采用体现二十世纪中叶最先

进和开明的“折衷”思想的国家宪章。正如币原首相所言，只要放弃国家的战争权，日本就甚至可能看到自己领导世界。对据说已沦为四等国家的骄傲民族而言，这是值得抱紧的新的民族主义的安慰。

387 无论如何，公众对新提案的反应，都与对松本草案压倒性的否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只有日本共产党表示反对。共产党的立场直截了当：天皇制的存续是反民主的，尽管共产党本身在国内曾受到军国主义分子最严酷的镇压，但是否定任何国家的自卫权利，是不现实的也是歧视性的。所有其他的主要政党，都认可3月份的草案。社会党甚至声称，政府新的立场本质上就是他们自身的主张。

构成币原联合内阁骨干的两大保守政党，当然没有立场批判政府发布的公告，但是他们表明支持的高姿态却令人惊讶。自由党赞赏被他们当作草案特征的三大原则：保存天皇制、尊重基本的人权和民主原则以及通过放弃战争建立和平国家。甚至是极端保守的进步党也戏剧性地变脸，宣称“衷心”欢迎新宪法草案。进步党现在主张，历史上天皇从未直接施行统治，因而新宪章提案下的天皇地位，实际上符合历史和现实。³² 只要经常重申，这种合理化的借口就很容易变成新的真理。许多保守主义者心情沉重，不得不承认草案，但是到了3月中旬，大多数的保守派也开始分享麦克阿瑟的信念：危机时期为守护天皇和皇室，新宪章确有必要。³³

数周过去了，普通公众对新宪法提案的意义有了更多的理解。3月6日内阁颁布的详细“概要”，仍然是以沉闷的、正式的文语体书就。大选一周后的4月17日，日常口语体的文本取代了文言“概要”。被称为“政府第四草案”的最终版本，于6月21日正式提交国会。

水流走，河还在

由于技术操作上的原因，新宪法被作为明治宪法的“修正案”，由天皇提交国会。无论对麦克阿瑟还是日本的天皇支持者而言，这都是幸运的：宪法的制定与对天皇的拯救合而为一，成了同一项任务的重大使命。因而，天皇参与了宪法制定过程的每一个重要阶段。6月20日，依照既定程序，天皇宣布临时国会召开，提交宪法修正草案及其他法案，并且希望国会以“协调的精神”审议这些议案。³⁴ 尽管新宪法规定主权

388

在民，但是这实际上表明了，主权是天皇赠予国民的礼物。“自上而下的革命”与“天皇制的民主”，在这一仪式中融合在了一起。

到宪法草案提交国会之际，最极端民族主义的和最反动的政客已经被清洗。新当选的众议院议员的阵容，是个多样化的群体，其中包括女性议员。保守派仍然在众议院占据支配地位，总体上比起前任者更加灵活通融。众议院同僚中，也不乏相当数量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贵族院由于占领当局的清洗政策空出的议席，被新当选的学识丰富、具有世界性视野的杰出人士所填补。既然最喧嚣的保守派被强制沉默，那么应当说，立法机关并不完全具有代表性。但是国会发出的新的声音，确实与真正的民主热情的显现相吻合。

显而易见，此后的国会审议是充满活力和实质性的。两院的全体会议和委员会讨论，共计历时 114 天。国务大臣金森德次郎，继松本烝治之后担任有关宪法问题的内阁首席发言人，大约答复了 1300 个正式质询，有些回答十分详尽。两院的国会审议笔录，最终合计超过 3500 页篇幅。³⁵

国会议员们最关注的问题是，宪法草案是否变更了“国体”，尤其是它牵涉到了天皇。假使回答是肯定的，那么国体是如何变更的？其次关注的问题是，令人震惊的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之含意。然而，议员们及时将注意转向了每一项条款。代表日本政府出席马拉松翻译会议的佐藤达夫后来承认，总司令部“看来对民意的最高代表国会充满敬意”。他认为，国会的审议“没有遗漏草案的任何部分”。佐藤推定，议会提出的修正案（必须经过盟军最高统帅的认可），其中“80% 到 90%”都获准采用。³⁶

日本政府对新宪法是否根本变更了“国体”的问题，其回答是绝对否定的。金森德次郎和新任首相吉田茂，几乎用上了表演杂耍的精力，来对付这一最敏感的问题。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女权主义者加藤静江当选为国会议员，她后来绝妙地描述了金森和吉田当时的行为。她说，吉田就会大声嚷嚷：“国体得以维持！让国务大臣来说明！”于是金森就会站上讲台，“叽叽咕咕地”说些拐弯抹角和令人费解的话。³⁷

加藤的说法不够厚道，但是涉及天皇和国体，吉田和金森的解释就被感情的逻辑所支配，而不是基于精密的法律或者正确的历史认知。吉

田总是宣称，“皇家与国民之间全无区别……天皇与臣民是一家……新宪法不会使国体变更哪怕一丝一毫。新宪法只是用不同的话语，表达日本自古以来的精神和思想”。仿佛连歌顶真的搭档一般，接着金森通过指出“水流走，但是河还在。这里蕴涵着我们关于宪法草案的基本观念”，³⁸ 以此揭示变动不休的题旨。

尽管这种对新宪法不可思议的肯定方式不过是种愿望，但是却引起了民政局内部的惊惶。惠特尼于7月中旬报告麦克阿瑟，日本官方关于新宪法没有变更国体的主张，贬损了新宪章的民主精神，并为独裁主义、沙文主义、军国主义以及日本人“独特性”和种族优越论的复辟铺平了道路。凯德斯由此进一步要求金森德次郎澄清宪法人民（国民）主权的纯粹性。实际上，就在此时，“主权”这个词取代了“至高”的译法。³⁹ 然而，在许多国会议员看来，新宪法可以被接受，仅仅是由于它保留了天皇超凡的地位。由芦田均任委员长的众议院宪法修正小组委员会的最终报告，证实并且承认了如下观点：

390

宪法修正的第一章明确规定，万世一系之天皇基于国民至高之总意愿，以确保其君主地位，团结统一国民与天地同在，直到永远。由此以确认俨然之事实：天皇虽处国民之中，然身在实际政治之外，仍保有其作为国民生活之中心及精神指导之源泉的权威。绝大多数之委员以最大之欢喜与意愿达成此项目的。⁴⁰

这些恭恭敬敬的陈述中，情感的流露与民族主义的挑战势头十分明显。然而，对许多人而言，这些主张使他们能够问心无愧地转向他们数月前仍难以想象的立场。一旦考虑明白不可思议的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他们甚至可能说服自己，在新的天皇制民主下，天皇的地位得到了升华，因为现在他超越了政治。1947年在新宪法生效后不久，吉田茂给他的岳父原内大臣牧野伸显写了一封私人书简，提到天皇与政治明确分离的后果，是天皇的“内在地位”——大概是指天皇的精神职能——“将更为扩大，天皇之地位的重要性和微妙性也将增加”。⁴¹

即使是在这些皇室崇拜的议论中，一些内阁大臣和国会议员也能保持冷静而不失幽默的看法。例如，内部人士将新宪法称为“山吹宪法”。

这个笑话是说，在新的宪章下，天皇现在就像山吹之花一样，尽管花开得漂亮，却不结果。同样，在表面上庄严肃穆的论争之际，两首咏金森的狂歌在国会中流传。这两首狂歌都是关于“宪法”和“剑法”谐音的双关语。一首歌问道，金森用的是什么奇怪的宪法程序（剑法流派）？另一首答道，金森是二刀流国体派，一刀变一刀不变。金森见招拆招，印证了自己确实是位娴熟的剑士。金森反击的方式极有技巧，他自己写了一首歌作答：名士之一剑看似二刀。无论其政治策略如何，他们的确都是机警聪敏之人。⁴²

民主的“日本化”

当国会审议之际，凯德斯上校访问了贵族院并告诉议员们，总司令部“很遗憾国会未能提出更多的修正案”。⁴³他说这话是真心诚意的。美国人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鼓励议员们积极参与修宪过程。毕竟，这是民主实践的样板，是《波茨坦宣言》建立反映人民“自由表达之意志”的政府的高迈理想的体现。国会可以自由做出所希望的一切改变，只要不违反 GHQ 的基本原则。

有关国会审议问题不那么显而易见的是，盟军最高统帅那只看不见的手的长度，以及有时日方的修正案所反映的盟军总司令部或者经由总司令部反映的远东委员会（FEC）的秘密指令的程度。那年夏天，远东委员会对宪法问题相当关注。美方小心掩饰他们对两院每日活动的介入。指示通常是口头而非书面下达。由于盟军最高统帅的坚持，众议院宪法修正小委员会的会议秘密进行，以便美方秘密传达指示。这些秘密会议的记录，也不准提及美方的干预。原本鼓励国会和媒体对宪法的自由讨论，但是直到 1949 年，所有触及盟军最高统帅对新宪章起决定性作用的言论皆被禁止。⁴⁴

盟军最高统帅无所不在的不容置疑的权威，在占领结束之后被一语道破。按照 1957 - 1964 年间进行调查的权威的日本宪法调查会的说法，即便美方并未直接干预国会审议进程之时，他们也要求日方能够通过“心灵感应”揣测其意。⁴⁵ 贵族院议员、原内务省高官沢田牛麿，以异乎寻常的热情抵抗占领当局的强制做法。沢田对宪法草案的采用投反对票的理由是，宪法修正的适当时机，应当在国家恢复主权之后。他主张，

急于采用新宪章根本毫无意义。他借用《朝日新闻》此前的比喻说，
392 “实际上，新宪法不过是借来的洋服，打满了太多的补丁，而且根本就不合身”。⁴⁶

据说，国会对政府的6月草案做了大约30项修正。⁴⁷然而，许多重大的实质性变更，多来自于盟军最高统帅部或者远东委员会的指示。例如，远东委员会通过盟军最高统帅部施压，导致国会强化了重要的诸项民主条款：普遍选举权、立法机构优先权以及首相与半数以上的内阁阁僚从国会议员中选举产生。在远东委员会的坚持下，国会还附加了一项条款，规定全体内阁成员必须是“文民”。⁴⁸

最终，由日方主导的重要变更数量很少。令人震惊的是，国会表决通过了社会党的动议，立即废除华族制（皇室除外）。美方反而只要求停止将来再赋予华族任何特权。社会党某种程度上受魏玛宪法和1936年苏联宪法的影响，还成功引入了如下条款：“所有国民有保持最低限度的健康文明生活之权利”、“所有国民皆有劳动之权利和义务”，劳动条件由法律保障。⁴⁹

草根压力奏效的一个有意味的事例是，成人教育学校与夜校的教师联盟，成功地说服国会，取消了6年制初级义务教育的限制规定。教师联盟直接向文部省、盟军司令部和政治家们进行游说，主张教育不能仅仅使精英人士受益。最终的条款保障全体国民“按照法律规定，依其能力接受平等教育的权利”，成为此后立法确立所谓六三制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基础。⁵⁰

宪法最终草案中最为民主的方面之一，也是由草根提议发起的，并且影响到了此后正式官方文件使用的语言性质。此前，包括宪法在内的法令和文书，都是以文语体书就，这种古旧晦涩的文体一般民众难以理解。4月中旬之后，政府呈交的文件使用口语体书写。这一变化，具有极大的实践和象征意味。它表明法律和全部的公文，不再仅仅属于特权阶层掌控的领域。结果是，随后民法和刑法的全部文献也变换为口语体。引入这一影响深远的变更的决定，完全来自于日方。其动议不是源于日本政府内部，而是源于游说语言改革的学者和知识阶层。⁵¹

至于反动性的修正案，日本政府和国会成功废除了《在留外国人法》为外国人提供平等保护的条款，从而有损于盟军总司令部的初衷。



利用旧有的民众娱乐和教育手段——纸芝居，街头的群众受到了有关新宪章意义的教育。标牌和纸幌上写的是“新宪法施行纪念”。

其基础工作是由佐藤达夫在马拉松翻译之后数小时内完成的，当时他向民政局递交了一项看似无关紧要的请求，要求以重复累赘为由准许削除有问题的条款，另行在宪法草案之外提供法律保障。美方予以批准，当时并不知晓日方的文字游戏是将外国人排除出受保护之列。在这里日方 394 使用的关键词是“国民”，故意用这一更具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来翻译对应宪法草案的“the People”（人民）。实质上，保守派使用“国民”一词，不仅是要削弱人民主权的含意，而且要将国家保障的权利局限于持有日本国籍者。当美国人试图肯定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GHQ 草案明确规定禁止基于人种或国籍的歧视时，佐藤及其同僚却通过玩弄语言游戏抹去了这些保障。通过将“国民”解释成“所有持有国籍的人”，日本政府成功否认了包括台湾人尤其是朝鲜人在内的数十万旧殖

民地出身的在日外国人的平等公民权。这种露骨的种族主义性质的修正条款，随后在国会审议中以“用语上的”修正为名加以强化，并为1950年通过有关国籍的歧视性法案打下了基础。⁵²

也许……放弃战争

全方位看来，宪法草案中最具冲击性的部分，是序言和第九条中提到的“战争的放弃”。毫无疑问，这遭到了国会的集中袭击。最终，议员们对第九条的措辞进行了修正，使得无人能够理解其确切含意。由此造成的含糊其辞将遗留下去，成为占领期最为复杂困惑的遗产：宪法第九条究竟是允许还是禁止出于自卫目的的限定武装？

呈交国会的第九条全文如下：

国家主权之发动战争，与武力之威吓或行使，作为解决与他国间纷争的手段被永久抛弃。

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的保持，将不被许可。国家的交战权将不予承认。

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发誓成为不安定的世界中非武装的国家？许多国会议员表示忧虑：这将使日本处于危险之中。另外那些被日本可能加盟联合国的想法所吸引的议员质问，如果日本不能满足成员国对集团安全做贡献的要求，是否就不可能加盟联合国？对“第九条是否禁止甚至是出于自卫目的的武装？”这一直截质问，日本政府通常回答是，但有时却回答不。当这些弯弯绕的审议完成之时，任何人都可以回头找出当日的记录，征引一番以支持各自的立场。

4月4日，在宪法草案提交国会之前，松本烝治出席枢密院的秘密会议，并被直截质问放弃“交战权”是否意味着禁止自卫战争。他回答说并非如此。松本声称，“‘交战权’指的是宣战，并不旨在禁止自卫行为”。⁵³另一方面，在国会召开之际，吉田首相有相反的表述。6月26日，吉田指出宪法第九条放弃交战权，也随之放弃自卫权。他评述说，所有的侵略战争，包括日本近来自1931年开始的侵略战争，都是以自卫的名义发动的。

两天后，当野坂参三质疑这一宪法制约时，吉田首相趁机做出了详细说明。共产党领导人宣称，有必要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当牢记这一点时，显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卫的权利。自诩“现实主义者”的吉田，发现自己在为理想主义的现实态度而辩护。他反驳说，“战争有被国家合法的自卫权正当化的可能，但是我认为那种想法是有害的”。日本今后的安全保障，将有赖于国际性的和平组织。此后的数年间，吉田以不同形式重申了对第九条的这一解释。⁵⁴

在审议的最终阶段，众议院采纳了由芦田均领导的颇具影响力的宪法改正小委员会提出的对第九条文辞的变更。经贵族院认可，以下为新宪法的最终文本：

日本国民出于对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的诚实希求，永久放弃作为国家权力的战争权与以武力威吓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纷争的手段。

为达前项之目的，陆海空军及其他战力，将不得保持。国家的 396
交战权，将不予承认。

因提案的变更须经盟军司令部的承认，芦田均事先请求司令部对新措辞的许可。凯德斯上校和惠特尼准将立即予以批准。显然三人并未讨论修正背后的缘由。⁵⁵

在此后的岁月中，所谓的芦田修正案，被用来论证第九条最终之形式并未禁止自卫目的之再军备。其主张为，第一款论证了维持国际和平是第九条之目的。既然如此，第二款的导入句（“为达前项之目的”）必须放弃“战力”，指的是保持侵略战争的能力，将会妨害世界和平。芦田均自己后来声称，他从一开始的目的，就是通过这一变更为未来自卫目的之再武装开道。然而，这种观点却从未出现在国会审议当中。而芦田均率领的小委员会此后多年间仍被视为机密的议事录，揭示了无论芦田或是其他委员，从未以容许“自卫”的视角来议决他们的修正案，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此种暗示或理解。当时大部分的国会审议，意见相当分散，经常不甚连贯。但是有一次，芦田均的确解释说，他只想使第九条有关日本不保持战力的约定，不像是那么“被动”的承诺。⁵⁶

国会议决宪法最终草案之时，政府首席发言人确认，第九条禁止保持一切战力。数度参加众议院秘密讨论的金森德次郎，应邀向贵族院宪法特别委员会说明第九条的新文本。他强调了对武装的绝对放弃。9月14日，金森向委员会解说，“第九条的第一款并未放弃自卫权，但此权利在第二款事实上已经放弃”。换言之，他说“第二款的实际宗旨是，即使自卫战争也不能进行”。前首相币原同样向此委员会毫不含糊地断言，在第二款下，“日本不能拥有任何战力与外国开战的事实是非常明白的”。⁵⁷

在此时刻，远东委员会以令许多议员震惊的异乎寻常的方式介入。7月份，远东委员会敦促麦克阿瑟增加宪法条文，规定只有“civilians”（文民）才能担任内阁职务。麦克阿瑟将军无视这一要求，但是9月21日在华盛顿参加会议的远东委员会的中国代表，注意到第九条的新措辞，指责这样含混暧昧的语言，事实上可能为今后某种形式的再武装留下缺口。然而，远东委员会并未敦促严密第九条之行文，而是再次要求内阁成员必须限于文民之身份。麦克阿瑟与盟军总司令部感到，为避免远东委员会的责难，他们必须遵从其要求。

9月26日，在贵族院提出这项迟到的修正案时，当然引起了混乱：因为如果第九条禁止陆海空军，那么从逻辑上可以推定，不可能有常设的军事组织可以选出内阁成员。议员们质问，提案规定的意图，是否可能是要防止原军人担任内阁职务？那么对近年来曾经为国家服役的年轻人而言，这自然是歧视性的。贵族院特别设立了委员会，以检讨远东委员会的要求，结论是此项条款没有必要。这次轮到麦克阿瑟传话了，他提出务必要使远东委员会满意。贵族院议员别无选择，只得集中精神创造出新词汇以对应英文词“civilian”。在新造的复合词“文民”被采用之前，大约有7个以上的词汇曾作为候补。⁵⁸

无论远东委员会用意何在，奇妙的“文民”条款成了新宪法的第六十六条，无意间削弱了第九条禁止保持任何战力的主张。毕竟，从内阁中排除军事人员，即是假定军人的存在是国家机能的一部分。10月21日，当金森德次郎向枢密院秘密说明新宪法之时，他提供了与一个月前他在贵族院委员会的版本全然不同的解释，使得这种暧昧状况变得更为复杂。特权组织枢密院（新宪法下将予以废除）的议事录记载，金森

“解释容许保持军队以维持国际和平”。⁵⁹ 11月3日，新宪法公布日刊行的《新宪法の解释》读本中，芦田均初次公开做了同样的解释。他声明，第九条“实际意图指的是放弃侵略战争。因而，此条款不放弃自卫目的之战争与武力的威吓或武力的行使”。⁶⁰ 盟军司令部对此见解未加驳斥，然而此立场从未得到日本政府的明确支持。

事实上，此后数年间，吉田首相发表的见解与此大不相同。1950年1月，他明确声称，“日本的自卫权将是不诉诸军事力量的自卫权”。同月，在参议院（取代了原先的贵族院）的即席发言中，吉田竟表示，“假使我们心中存有以武力自卫的念头，或是万一在战争中以军事力量来自卫的念头，那么我们自己将会妨害日本的安全保障”。这位年事已高的首相建议，真的安全保障，在于赢得他国的信任。⁶¹



“放弃战争”的理想，表现在小册子《新宪法的故事》中的这幅著名插图中。此书于1947年由文部省发行，数年间被作为中学教科书使用。

吉田的这些说法确有讨好听众的因素。他确信尽早结束占领，使世界各国重新接受日本的最佳途径，就是强调彻底放弃军国主义。⁶²然而与此同时，第九条对饱受战争之苦、在多国间背负军国主义者和不讲信义者恶名的战败的日本人民而言，还有难以抗拒的心理魅力。放弃战争、成为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理想纯粹的体现者的可能性，在战败之后为日本人提供了肯定自身独特价值的道路。

这些事件发生 35 年之后，查尔斯·凯德斯反观第九条日文解释的矛盾之处，不由回想起十五世纪一位英国法官的话：“不要以魔鬼的恶意揣测人心，因为那并非人心所想。”⁶³就宪法第九条而言，最初的混乱，更多是由于草案措辞的拙劣，而并非出于阴险的企图。此外，在继续被占领的状态下，自卫问题很难成为紧迫性的关注所在，直至 1950 年 6 月以朝鲜战争爆发为契机开始重新武装之时。当时保守派和美国人同样在芦田修正案的暧昧言辞中找到了漏洞，而再军备的反对者们捍卫着非武装中立的理想，他们确信他们的“和平宪法”，坚实地植根于这一理念。宪法第九条，成为其后数十年间使国家深受其害的论争之试金石。

对既成事实的反应

国会议员可自由投票反对宪法草案，但是最终很少有人这么做。众议院投票表决的结果是，421 票赞成 8 票反对。对贵族院而言，通过草案意味着华族制本身的立即废止。结果却是以全体起立、一致同意的票数，通过了对新宪章的采纳。（据 GHQ 计算，300 票中仅有 2 票反对。）在国会投票中，反对宪法草案的主要是共产党议员。

愤世嫉俗者会说，这种近乎全体一致的对征服者理念的拥护，只能证实高人一等的英美研究者向来的观点：日本人对追随权威，具有“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的倾向”。正如 1946 年初美国国务院的乔治·艾奇逊（George Atcheson）所言，“日本模仿美国——不仅模仿美国的机械还有美国的理念——的时代”正在到来。⁶⁴

对某些人而言，情况可能确实如此。当时日本的怀疑派和焦虑的自由主义者，都有这样的说法。然而，当时的政治和思想动态十分复杂，并非如此简单化的大众心理认识所能说明。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对采取

新宪法一致投赞成票，反映出的不是体制顺应主义或者封建的“日本的”价值观，而是任何地方民主的政党政治通常的特征：维护政党的纪律。除共产党之外，各个党派的领导者都支持宪法修正，党员自然保持一致。

许多务实的保守党领导人还相信，尽管此刻他们少有选择只得附和征服者，但是以后有可能撤销已经做出的决定。采用民主的、和平主义的国民宪章，有可能会加速占领的终结。一旦重获独立，宪法可以被修正。吉田茂后来后悔地解释说，这一直是他对付美国改革者议程的哲学。他坦承：“我总是下意识地有这种想法，无论有何修正的必要，等日本重获独立后都能修正过来。然而一旦做出决定，再改变就困难了。”⁶⁵

1946年11月3日，明治天皇诞辰94周年之际，裕仁天皇颁布新宪法，于6个月后施行。（在挑选爱国主义的纪念日方面，战败者与胜利者同样乐此不疲。）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典。在东京，10万人聚集在皇居前纪念这一重要事件。作为皇恩浩荡的又一证据，天皇颁布大赦，33万服刑者得到恩赦。这是天皇最后一次如此浩大地行使皇权的机会。⁶⁶

一个月后，日本政府还发布了将继续使用天皇纪年的历法的决定。⁴⁰¹12月5日，为回应国会的质问，日本政府声明维持“元号制”，意味着纪年继续以现任天皇的元号与其在位年数计算。依此算来，宪法颁布于昭和二十一年。这是保守派倍感欣慰的胜利。因为这是以冠冕堂皇的日常方式重申，由于他们的天皇制，日本人是独特的，生活在他人无法分享的王国。当任何人看到出版物上印制的日期，他们就会记起天皇的存在。⁶⁷

1947年5月3日，宪法生效之日，这是一个几乎谁都可以根据自己选定的方式来纪念的日子。皇居前的广场上，一支日本铜管乐队的庆祝方式，是吹奏起《星条旗永不落》。⁶⁸枢密院的最后一任议长、裕仁天皇的明治宪法个人教授清水澄，如此苦恼于天皇制的民主化，以致在数月后自杀。⁶⁹而枢密院是最终议决采用新宪法的实施机关。另一方面，天皇的幼弟三笠宫，向东京帝国大学发行的报纸寄去了令人瞩目的评论，严厉批评天皇和政府当日举行庆典方式的非民主化。三笠宫因染恙未能出席庆典，但是庆典的某些问题使他困惑。为何给他的请柬上只有他的名

字，而没有他妻子的名字？为何请柬只提到了天皇而没有提到皇后？三笠宫评论说，他感到尽管日本妇女最近首次入选国会，但是她们无疑仍然面临艰难的斗争。

三笠宫收听了庆典广播，对继续使用专为皇室保留的特殊敬语大为震惊。如果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化，语言也必须民主化。语言的民主化应该就从改革迄今仍为天皇保留的特殊用语开始。三笠宫还震惊于这样的事实：天皇在庆典开始时并未到场，而是举行了盛大入场式。三笠宫被吉田首相迎接天皇入场时三呼“天皇陛下万岁！”的行为吓了一跳。
402 据三笠宫评述，如果是天皇的即位仪式，这么做可能合适，但是对于主权移交国民的庆典而言，就不那么合适了。

这实在是破坏偶像的有趣评论。裕仁天皇在考虑退位之时，排除将其幼弟作为可能的继任者或让他为皇太子摄政，看来确有原因。事实上，三笠宫的反思远未结束。他口出狂言，而此时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他得意地大笑——假使庆典的策划者们将高呼“天皇陛下万岁”改为天皇带头欢呼“全日本国民万岁”，就合适多了，或者由首相率领包括天皇在内的全体人员欢呼万岁也行。又或者，要求天皇代表热爱和平的新日本，带头为全世界的人民欢呼万岁。三笠宫总结道，无论如何，皇室的民主化，将是日本真正民主化的开端。⁷⁰

新宪法的采用，迫使盟军司令部与日本政府都慌忙行动起来。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亲族法、皇室典范，全部都被迫进行实质性修正，并以口语体重新起草。同时，开始推进大规模的教育运动。新宪法生效当天，政府发行了 2000 万册题为《新しい宪法，明るい生活》（《新的宪法，光明生活》）的袖珍小册子。这一惊人的发行量，是为保证每个日本家庭都有一册。

《新的宪法，光明生活》仅有 30 页篇幅：芦田均（众议院宪法改正小委员会委员长）的发刊辞一页，包括几幅插图在内的充满光明的序文 13 页，以及宪法全文。小册子是应 GHQ 的坚决要求发行的，与宪法本身同样是被强制书写的文本。同时它也传达出许多日本人真心拥护的理想主义精神。尽管对“麦克阿瑟宪法”的修正，甚至在占领结束之前就已经成为某些保守派集团的民族大业，但是《新的宪法，光明生活》单纯、乐观的语言艺术，在此后的数十年间一直保持着足够的大众魅力以

挫败任何修宪的企图。

芦田均简短的发刊辞以平实而动人的陈述开始：“旧的日本被投进阴影之中，新的日本诞生了。”今日之国民将基于人性彼此尊重。他们将实践民主主义。与他国之关系将以和平的精神践行。新宪法大胆宣言 403 “我们不再发动战争”，表达了人类的崇高理想，而建设和平世界是日本新生的唯一途径。

序言以 1947 年 5 月 3 日为新日本的誕生日开篇，旋即宣布宪法最大的“赠予”是民主，即意味着“民治、民享、民有的政府”。天皇不再是神，而是国民统一的象征，正如富士山象征着日本的风光明媚，樱花象征着日本美好的春天。新宪法被描述为绝不再次发动战争的誓言（此处配有插图：一只垃圾桶里装满了大炮、炸弹、战车、军用飞机和军舰，另外还有一条死鱼和两只嗡嗡叫的苍蝇）。平等、人的尊严、幸福、“自由的喜悦”得到强调。重要的是人活着要合乎自己的良心。还有男女平等。（此处插入一幅浪漫的素描：一对年轻夫妇手拉手跪坐在一起，在他们相握的双手上方，画着交叠的爱心和一个惊叹号。背景中是一对震惊的老夫妻。）官吏如今成了公仆。国会是人民的喉舌。司法机关是宪法的守护者。新宪法的精髓是“国民的政府与国际的和平”。⁷¹

这无疑是征服者要求的宣传，而且是极端单纯化的表达。它拨动了国民的心弦。然而，宪法既成事实的强制力之强大，寓于如下事实：即便是起初顽固支持明治宪法的日本政府高官，竟也及时认同起新宪法的许多基本原则。前内阁首席发言人金森德次郎，就是思想产生显著变化的绝好例证。在 GHQ“宪法制定会议”之前，金森协助起草了自由党保守的宪法修正案草案。作为吉田内阁的宪法问题担当大臣，他被迫不情愿地将 GHQ 草案作为日本政府自身的提案成果。这些艰巨的工作完成两年之后，金森主动写了一本儿童读物《少年と少女のための宪法のお話》（《少男少女读宪法故事》）。他仍然浪漫地美化天皇，但也有力地书写了和平、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等伟大理想。金森告诉他的读者们，对于宪法修正，必须极其谨慎。他的结论如下：“我们务必要尊重 404 和保卫宪法。尽管道路漫长，让我们坚定地、一步一步地，向着理想的光明共同迈进。”这些话可不是他被迫说的。⁷²

金森的前任宪法问题担当大臣松本烝治，却不能如此安然顺应宪法

的既成事实。在体味屈辱的十多年之后，松本已是八十高龄，他傲然宣布自己从未屈尊读过新宪法的最终版本。⁷³ 另一方面，前首相币原曾泣告阁僚，他们只会受到后世子孙的蔑视，后来却自豪地宣称，最初是他自己向麦克阿瑟将军提出放弃战争的理想。此事十有八九是这位老者记忆有误。然而，无论事实还是虚构，币原真心接受“反战”的理想，使这样的主张变得令人信服：终究，新宪法确实反映了日本理想。⁷⁴

裕仁天皇内心对新宪法作何感想无从知晓，但是凯德斯上校及其数位同僚接到了天皇表达的谢意。他们每位收到了一只小小的银杯，杯上饰以皇室纹章十六瓣菊花的金浮雕，而且铭刻着新宪法施行纪念的标记。⁷⁵

注释：

- 1 Kades (1986), pp. 282 - 283. [本章引文出处沿袭第12章的标示。]
- 2 这三位助手是 Kades 上校、Hussey 中校和 Rowell 中校。官方的会谈记录，参见 *TOT/RP* 1: 320 - 336。亦参见 Kades (1989), pp. 228 - 230; Kades interview (*GI*), pp. 34 - 40。
- 3 Courtney Whitney, *MacArthur: His Rendezvous with History* (New York: Knopf, 1956), p. 251; *TOT/RP* 1: 324。
- 4 古关彰一《新宪法の誕生》，p. 127。
- 5 *TOT/RP* 1: 336 - 340, 346; *PRJ* 2: 624。
- 6 *TOT/RP* 1: 352 - 364。在某些方面，松本委员会与盟军民政局之间的冲突，再次上演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华盛顿方面“中国派”与“日本派”之间的对决。
- 7 Kades (1986), p. 288; *TOT/RP* 1: 366 - 370; *PRJ* 1: 106。随后 GHQ 的最终期限延长到 2 月 22 日。
- 8 有关这些阁议的最重要的日文史料，是芦田均的日记，直到 1986 年才发表。参见《芦田均日记》（东京：岩波书店）第一卷，p. 77（1946 年 2 月 19 日）。1954 年，松本公然提出对惠特尼的立场更为苛刻的说法。他声称惠特尼将军曾经说过，如果日本政府不接受 GHQ 草案，将无法保全天皇的“圣体”。通过这样的表达，惠特尼似乎在恐吓日方：如果他们不接受 GHQ 草案，SCAP 本身可能会对天皇采取不利行动。这一令人质疑的证言，可能造成对历史事实的误解，引发论争。参见入江俊郎《宪法成立の経緯と憲法上の諸問題》（东京：第一法規，1976），p. 199; *JCC/FR*, pp. 75 - 77; Takayanagi (高柳贤三), pp. 77 - 78; 古关《新宪法の誕生》，pp. 129 - 131; Kades (1989), pp. 229 - 230; 江藤淳《一九四六年憲法の拘束》，pp. 33 - 38。
- 9 《芦田均日记》第一卷，p. 77（1946 年 2 月 19 日）。
- 10 《芦田均日记》第一卷，pp. 78 - 79（1946 年 2 月 22 日）。亦参见芦田均的证言，

- 《宪法调查会第七次总会议事录》，1957年4月5日；TOT/RP 2: 392（2月22日 Whitney 对松本的声明）；McNelly（1982），p. 23。
- 11 TOT/RP 1: 380-398.
 - 12 古关《新宪法の诞生》，p. 134-135；TOT/RP 1: 460。至于天皇到底说了些什么，看法不一；参见 Bix（1995），p. 339。
 - 13 Whitney, pp. 250, 253.
 - 14 TOT/RP 1: 402-410.
 - 15 日本政府总共制定了4种草案，均收录于 PRJ 2: 625-648。
 - 16 Kades interview (GI) 1: 11-12, 2: 45-47。佐藤达夫对此事件发生时间的说法稍有出入，参见 Inoue, *MacArthur's Japanese Constitution*, pp. 172-173。
 - 17 Kades interview (GI) 2: 34-35, 40-45；古关《新宪法の诞生》，pp. 144-146。
 - 18 Williams, pp. 115-116；古关《新宪法の诞生》，pp. 138-151，尤其参见 pp. 140-144；McNelly（1952），pp. 171-194；PRJ 2: 625-636（可对照参看各草案）。关于外国人的权利，参见古关彰一的日、英文著述：Koseki（1987），pp. 11-13；Koseki（1988），pp. 235-236；《新宪法の诞生》，pp. 148, 160。关于地方自治，参见 Akira Amakawa, “The Making of the Postwar Local Government System”, Ward 与 Sakamoto 前引书，pp. 259-260。
 - 19 Inoue 在书中较为详细地辨析了这些语言问题，并在其分析中援引佐藤达夫，pp. 184-205，尤可参照 pp. 188-190。民政局的三名顾问 T. A. Bisson, Cyrus Peake 和 Kenneth Colegrove，向 Whitney 和 Kades 强调了“国民”一词的可疑性质；参见 T. A. Bisson 的手稿，“Reform Years in Japan, 1945-1947: An Occupation Memoir”，此手稿出版了日译本，但未有英文本出版；参见中村政则、三浦阳一译《日本占领回想记》（东京：三省堂，1983），pp. 188-193。
 - 20 Inoue 的 *MacArthur's Japanese Constitution* 一书，对随后有关“国民主权”的国会辩论做了多处摘录，pp. 205-220。亦参见古关《新宪法の诞生》，p. 151。
 - 21 这两份草案收入 PRJ 2: 625-636。对12点差异的概括，参见 McNelly（1952），pp. 192-193。
 - 22 木下道雄《侧近日记》（东京：文艺春秋，1990），pp. 163-164（1946年3月5日）。
 - 23 《芦田均日记》第一卷，p. 90（1946年3月5日）。亦参见佐藤达夫的回忆，《ジュリスト》1955年8月15日号，p. 34。
 - 24 PRJ 2: 657；日本文献的英译，参见 McNelly（1952），pp. 195-199。
 - 25 对宪法修正过程中天皇的权威的影响力的分析，参见矶田进《新宪法の感觉を身につけよう》，《世界》1947年8月号，pp. 22-27，尤可参见 p. 24。
 - 26 “紧闭的门后”的说法，见于 Bisson 未发表的手稿，p. 196。
 - 27 《读卖新闻》1946年3月8日；引自 Williams, p. 134。
 - 28 Takayanagi（高柳贤三），p. 77；对照 Tatsuo Satō（佐藤达夫），p. 385。
 - 29 例如，参见1946年11月25日的审阅日志，收入 Etō Jun, “One Aspect of the Allied Occupation of Japan: The Censorship Operation and Postwar Japanese Literature”, occasional paper of the Wilson Center,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 C., 1980), pp. 17-20。

- 30 据 GHQ 审阅部前官员 Robert Spaulding 的回忆，参见 L. H. Redford 编，*The Occupation of Japan: Impact of Legal Reform* (Norfolk: Douglas MacArthur Foundation, 1977), p. 58。
- 31 当日新闻界的反应，参见 Williams, pp. 133–142; McNelly (1952), p. 271。外务省的秘密调查发现，当时公众的反应多少有些困惑。参见古关彰一《新宪法の诞生》，p. 162; 江藤淳《一九四六年宪法の拘束》，pp. 60–61。
- 32 McNelly (1952), pp. 271–276。
- 33 例如，参见 JCC/FR, p. 78。
- 34 参见 McNelly (1952), p. 317。
- 35 Inoue, pp. 32–35; Williams, p. 142。
- 36 Satō, p. 384。亦参见佐藤达夫的证言，Tanaka (1987), p. 124; Takayanagi, pp. 80–81; Yoshida Shigeru (吉田茂), *The Yoshida Memoir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2), p. 143。
- 37 1996 年 1 月 25 日，99 岁高龄的加藤静江接受《朝日新闻》采访时，发表了此番评论。时过境迁，当这篇访谈提到“国体”一词时，《朝日新闻》不得不附加说明，向今日的读者解释何谓“国体”。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一战争年代最具意识形态意味的词汇，曾经动员了整个国家、此后保守派又曾经为之斗争哭泣的概念，在当今语言中早已消亡。1946 年的国会辩论，是“国体”作为公认的核心概念的回光返照，研究此后这一概念的边缘化，将是一个有趣的题目。最终“国体”成了只与极端右翼的思想家相关联的语汇。
- 38 对议会中“国体”质询的论述，参见 Dower (1979), pp. 318–329; 亦参见 PRJ 1: 93。
- 39 Dower (1979), p. 327; Inoue, p. 206; 古关《新宪法の诞生》，pp. 213–221; McNelly (1987), pp. 90–91。
- 40 Dower (1979), p. 326。
- 41 Dower (1979), p. 329。
- 42 古关《新宪法の诞生》，pp. 210, 212。
- 43 Takayanagi, p. 80; 对照 Kades interview (GI), 1: 15; Kades (1986), p. 277。
- 44 McNelly (1987), pp. 84, 89–90, 96–97; Etō Jun, “The Constraints of the 1946 Constitution”, *Japan Echo* 8.1 (1981), pp. 44–50; Satō, p. 384。1949 年 SCAP 的记录 *Political Reorientation of Japan* 公刊，坦率承认了占领军对筹备日本宪法草案的作用，使许多人大为震惊。众议院宪法改正小委员会（即所谓芦田委员会）的议事录，直到 1995 年才披露，此时速记记录已有 6 处脱漏。参见众议院第 90 回帝国议会《帝国宪法改正案委员小委员会速记录》（众议院事务局，大藏省印刷局，1995）。但当时新闻报道并未将脱漏原因断定为占领军的干涉；参见《朝日新闻》1995 年 10 月 1 日。
- 45 JCC/FR, p. 81。领导宪法调查委员会的高柳贤三，尽管强力支持日本宪法是日美合作产生的理论，但是提出了重要的两点：一是，日方对宪法制定的直接和间接输入，比通常所承认的更具实质性；二是，宪法确切地反映了日本人的希望。参见 JCC/FR, pp. 224–225; Takayanagi, pp. 71–88。
- 46 参见 Satō, p. 387。沢田对明治宪法的激情辩护的英译文，见 Inoue, pp. 199–200。

贵族院议员、法学者佐佐木一也反对新宪法；McNelly (1952), p. 364。

- 47 这些修正仅为列举，未加评论。参见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下引为 *FRUS*]，1946，vol. 8，pp. 359–364。
- 48 《朝日新闻》1996年1月22日 (p. 12)；此报道披露了有关“文民”问题新公开的史料，以及新解密的金森德次郎的陈述，内容是GHQ要求日本国会所做的修改。亦参见 McNelly (1952)，第7章（尤其是 pp. 267–269）。与2、3月份忧虑远东委员会将对天皇制形成“国际性”的威胁的预期相违背，远东委员会并未对天皇制采取批判立场。与此相反，1946年4月4日，远东委员会免除对裕仁天皇进行战争罪行的起诉。
- 49 比较 McNelly (1987)，p. 92；Koseki (1987)，p. 15；古关《新宪法の誕生》，pp. 225，233；Kades (1986)，pp. 284–285。社会党的片山哲（曾参与众议院的宪法制定审议，1947–1948年日本首相），对那些主张宪法是外国强加给日本的人进行了简练的反驳。他说，宪法是强加给反动派的，而非强加给民众；引自 McNelly，*“The New Constitution and Induced Revolution”*，p. 159。
- 50 古关《新宪法の誕生》，pp. 228–233；《朝日新闻》1995年10月1日，p. 17。当1995年众议院宪法改正小委员会（芦田委员会）的秘密议事录（本章注44）公开之时，有关教育的条款，被评价为宪法中最直接反映“民众之声”的规定。
- 51 Koseki Shōichi，*“Japanizing the Constitution”*，*Japan Quarterly* 35. 3 (July-September 1988)，pp. 239–240。宪法转换为口语体的主张的推动力，来自游说团体“国民的国语联盟”，其成员包括小说家山本有三、原法官三宅正太郎，后者曾遭SCAP开除公职。
- 52 Koseki (1988)，pp. 235–236；古关《新宪法の誕生》，pp. 160–161；《朝日新闻》1996年1月22日 (p. 12)。古川敦提示，佐藤达夫“非同寻常地”关注日本宪法平等对待外国人的可能性问题；参见袖井林二郎、竹前荣治编，《战后日本の原点——占领史の現在》（东京：悠思社，1992），上卷，p. 168。
- 53 1946年4月24日，枢密院审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关于向帝国议会提交宪法修正草案的议题；引自 Charles Kades，*“Discussion of Professor Theodore McNelly’s Paper, ‘General Douglas MacArthur and the Constitutional Disarmament of Japan’”*，*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third series，vol. 17 (1982)，pp. 35–52；尤可参见 p. 39。
- 54 吉田茂对第九条的态度，参见 Dower (1979)，pp. 378–383。
- 55 Kades (1982)，pp. 39–41；Kades (1989)，pp. 236–237；Kades interview (GI)，2：66–68。
- 56 1995年9月30日、10月1日，《朝日新闻》曾对解密的芦田委员会议事录做过详细报道。芦田委员会的议事内容，自1983年起就为日本学界所了解，因为当时在美国的档案中发现了大多数秘密听证会的英译。芦田均本人当日并未明确意识到，修正案将为自卫目的之再军备提供可能性，这一印象可从记述翔实的《芦田均日记》（1986）中得到印证，芦田的日记中并没有这样的说法。还可参见 Koseki (1988)，pp. 237–238。
- 57 贵族院宪法特别委员会议事录，1946年9月14日，第12号，pp. 36，78–82；参见 Kades (1982)，pp. 41–42。

- 58 贵族院宪法特别委员会的听证会，在第66条的“文民”规定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程度，相关议事内容直到1996年1月21日才解密。1996年1月22日的《朝日新闻》有详细报道。
- 59 1946年10月21日，枢密院审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记录；参见 Kades (1982), p. 45。
- 60 Koseki (1988), p. 237.
- 61 Dower (1979), pp. 382 - 383.
- 62 古关彰一指出，早在1947年4月新宪法实施之前，吉田茂的亲信朝海浩一郎就曾私下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外交官谈起，重新组建一支约10万人的日本军队；Koseki (1987), pp. 19 - 20。
- 63 Kades (1982), p. 46.
- 64 *FRUS 1946*, 8: 92.
- 65 吉田茂《大矶随想》（东京：雪华社，1962），pp. 42 - 43；亦参见吉田茂《十年の歩み》，《每日新闻》1955年8月9日。
- 66 *SNNZ 7*: 312.
- 67 *SNNZ 7*: 324.
- 68 Mark Gayn, *Japan Diary* (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48), p. 488.
- 69 Koseki (1987), pp. 20 - 21; *SNNZ 8*: 109.
- 70 三笠宫的反思，载《帝国大学新闻》1947年5月8日。收入《复刷版·帝国大学新闻》（东京：不二出版，1985），第十七卷，p. 354。
- 71 宪法普及会编《新しい宪法，明るい生活》（1947年5月3日发行）。这本小册子分发到了各家各户，参见大阪府编《大阪百年史》（大阪：1968），p. 912。
- 72 金森德次郎《少年と少女のための宪法のお話》（东京：世界社，1949）。
- 73 Koseki (1987), p. 20.
- 74 McNelly (1982), pp. 1 - 7。高柳贤三对币原主张的考证，参见 *JCC/FR*, pp. 74 - 75; Takayanagi, pp. 79, 86 - 88。
- 75 Kades interview (GI), 2: 72.